

第 42 卷



王蒙文集



第 42 卷

大块文章

(自传第二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孰能无过？孰能免祸？

写到了第二十四节，我忽然想起了青年时代读过的俄罗斯剧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一个剧名：谁能无过，谁能够免祸。他生活于十八世纪，不是后来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那个一般译作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

早在解放前的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歌咏活动中，我们就学会了奥著《暴风雨》一剧中的插曲：

顿河的哥萨克在河流上，
有个少年痴痴地站立在门旁，
因为他想着怎样杀死他的妻子，
所以他站在门边暗自思量……

歌词刺激，曲调别致，有好几个下滑音。

五十年代，曹禺给当时的文学青年王蒙讲过，话剧剧本有两种风格，一个是以契诃夫为代表的散文与诗的写法，一个是以奥斯特罗夫斯基为代表的悬念与冲突的写法。

回想本卷自传所写的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我所参与的政治风云，文学潮汐，社会动荡，地位浮沉；回想此期间我历任的北京市青联副主席，北京作协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委员，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编委、主编，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艺术研究院院长，文化部部长、党组书记，回想这十年我出版的《青春万岁》《冬雨》《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当你拿起笔》《夜的眼及其他》《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创作是一种燃烧》《漫话小说创作》《活动变人形》，以及各种有关争论，我愿意与读者共享孰能无过，孰能免祸的经验种种。

目 录

1. 要快乐,也要小心	(1)
2. 日子又开始了	(11)
3. 北戴河之夏	(21)
4. 八面来风	(28)
5. 大难之后	(37)
6. 难忘的东华门小驻	(49)
7. 陌生的夜的眼	(58)
8. 文联、文坛、文友	(71)
9. 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83)
10. 文思泉涌	(95)
11. 春之声	(110)
12. 搓麻雀的声音又响起了	(123)
13. 在美国思念新疆草原	(135)
14. 美国的枫叶	(145)
15. 注意精神	(156)
16. 一位先生与他的大方向	(168)
17. 《苦恋》风波前后	(181)
18. 吉凶祸福的测不准原理	(194)
19. “现代派”风波	(205)
20. 相差一厘米	(216)

21. 中央委员会	(229)
22. 清明	(240)
23. 难忘的一九八四	(254)
24. 孰能无过,孰能免祸	(268)
25. 我究竟是谁	(284)
26. 不一样的墨西哥与西柏林之夜	(299)
27. 你怎样与西方作家对话	(312)
28. 要你当文化部长	(324)
29. 换老婆的风波	(338)
30. 部长的滋味	(349)
31. 任凭风雨疾	(363)
32. 闲坐说玄宗	(374)
33. 官场一瞥	(386)
34. 走向世界	(399)
35. 世界真奇妙	(412)
36. 虫影	(425)
37. 十八岁出门远行	(439)
38. 北小街46号	(451)

1. 要快乐,也要小心

都说一九七八年把四个人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对于我来说,其兴奋,其感触,其意义,其命运攸关、生死所系,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解放: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席卷全国。那一次体会的是革命的胜利,是战胜者的骄傲和欢欣。这一次体会到的却是绝处逢生,黑暗的地窖子里照进阳光,绝望变成了希望,困惑变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每天都有盼头更有意料之中的与意料之外的喜讯。

《人民日报》立即重新发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这在毛著中是最最务实求真、通情达理、灵活机变,不搞教条主义、不搞绝对化、不照抄苏联模式的一篇典范之作。紧接着《人民日报》上竟然发表了反驳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字,大意说是经济都搞成了这个样子,还在那里批判“唯生产力论”,是不是要让我们喝西北风呢?其实这样的话,这样的说法,早已经在我的头脑里夹杂着叹息、怨愤说了不知多少遍了。绝对用不着什么水平什么理论的老百姓的常识,早就弄清了的道理,却由于政治的特殊情况变成了禁忌,而一旦这样的禁忌说破,就像皇帝的新衣本来无物一样的清晰,竟然有云开日出,天翻地覆的感觉。

却原来,鹿硬是可以在压力下被指成铁定的马,越不是马,就越要说成大马,而最后说破它就是鹿的时候,又伟大,又壮烈,又感人,又可悲,又可笑。

为了把鹿说成鹿,不是马,我们的伟大祖国,伟大人民,伟大的

党,付出了多少时间,多少代价,更新换代了多少机遇!

事后回忆这些事情的发生,似乎只在一瞬。谁能想得到,所有的所谓“铁案如山”都在土崩瓦解,所有的批倒批臭,都变成了批红批香。压在五行山下的各种文艺作品纷纷重见天日:人们又听到了“洪湖水,浪打浪”,人们又听到了王昆、郭兰英与各地戏曲名角,人们又看到了戏曲影片《红楼梦》、边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人们终于可以尽情吐露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而我在电视屏幕上看李维康主演的《蝶恋花》的时候,听到一句词提到“爱晚亭”“橘子洲”,竟然痛哭失声……人们感叹地引用着那几年上演的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反法西斯英雄瓦尔特(据说是以铁托为原型)的名言:“活着,就能看得见!”我们看见了,因为我们活着!而徐宝伦、L——李鲁、班长们看不见了……我们充满了怯懦偷生者的庆幸与欢喜!

郝关中老夫子几次对我说:“右派真的翻了天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常识常理常人常情平常的物品与形状行状都定成了右派,如果不狂言狂语、装腔作势就算右派,如果凡认定一加二一定等于三的都算右派,那么,什么创世功业,什么威猛泰山,什么辉煌旭日、雄辩江海、千钧霹雳、万里东风、玉宇澄清、乾坤扭转、新纪元新篇章新发明,还有令人头晕目眩的冲霄汉、上九天、反潮流、光芒万丈、光焰无际……不是早晚会稀里哗啦,踢里秃鲁的吗?

真正的日子渐渐来到,我意识到这一点,不敢完全相信……我必须格外小心,我相信还有反复,还有曲折,还有坎坷……再不会以为从此天下太平,顺风顺水啦。我好像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一件娇嫩的宝器,我生怕由于自己的不慎而将宝器打碎,与宝器失之交臂。我已经痛感一切美好都是那样脆弱,而一切横蛮与困厄都是那样顽强纠缠乃至貌似威严。我不当出头椽子,我必须若无其事。但是我还是流露了我的压不住的快乐,以至于一些和我要好的亲朋好友,都善意地告诫我:天道无常,上心难测,慎重,慎重,第三还是慎重——

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什么也不要说。

而春风在悄悄地吹着，回到常识的过程日进百米。我填了四首词，表达我的心情：

〔满江红〕浪打洪湖，歌又起，深情瑰丽。十数载，韩英无恙，万感交集。征战情怀须作赋，英雄血性岂无戏。恨四人，杀了好文章，园坛寂。贺龙已，总理逝，洪湖水，长相忆。念主席，今日得人后继，莲艳波清愁雾扫，龙腾虎跃车轮疾。待从头，描画好山河，挥彩笔。

〔满江红〕古国千年，有多少，风流故事。拍案喜，尸魔伏法，猴儿淋漓。信手拈来成妙趣，随心舒卷含真谛。舞金箍，除尽白骨精，方如意。取经远，磨难续，心似铁，何为惧？霎时间，大圣巧施神力，摇扇喷沙贼老道，盘丝螫顶野狐狸。善矣哉，轻轻收将在，葫芦里。

〔双头莲〕烈士英名，映江山万代，蝶恋花开，情深如海，真绝唱，能不热泪满怀！一个小小鼠豺，竟招摇叫卖，施淫威，英雄寂寞，却似雾遮云盖。盖也盖不住的，有人民八亿，铭心记载，骄阳光彩。风雷动，消去胸中垒块，长沙陵园永在，唱游仙词牌。歌澎湃，开慧巍巍，江青尘埃。

〔双头莲〕革命惊雷，唤中华儿女，血染红旗，悲歌国际，头颅掷，花媚神州大地。谁道“四丑”横行，冷男儿心意，堪痛惜，残害忠良，玷污马列真义。主席功业千秋，容毁于一旦？遥望京畿，忧心如炽，何日里，得慰英灵遗志？忽报缚鬼擒妖，升果杲红日，泪如雨，遍洒江河，追怀总理。

第一首写重睹歌剧《洪湖赤卫队》，第二首写到了《孙悟空三打

白骨精》，第三首则是写在从电视里看到李维康演的《蝶恋花》后。龙腾句则出自第一批解禁的影片《龙腾虎跃》与《车轮滚滚》。“游仙词牌”则是指毛主席写的《蝶恋花》。虽然写出来的都是共识，都是规范语言（除一句“猴儿淋漓”较有王蒙特点），仍然堵不住我的真情实感，包括政治情怀。

又，我过去也填过若干词，没有一首留下来或发表过。这四首也是多亏新疆文友陈柏中、楼友勤夫妇保存。最后一首是三十余年后的近日才发现的，下面是陈柏中同志当年的记录：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吾在庫車維吾爾農村支農，王蒙兄來信，內有他的新詞“雙頭蓮”一首見示，現抄錄，備日後重讀，慷慨話當年矣！

幸亏有他的抄录。

我曾拿我填的词给剧团的一位朋友看，恰值另一位搞舞台美术的人在那里。他真诚地问我，你写这些个有什么用啊？我觉得他实在是问得诚恳，问得好。我就是做了一辈子没有啥大用的事。聊以解嘲的是，按庄子所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也”，这里讲的一个人的容足之地以外的地面的无用，这种无用其实是备用将用随时用。没有任何无用的储藏，这个人能够有用吗？另外庄子也讲过“树无用而免遭斤斧”，叫做无用之用，并叹息：“世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也。”

同时我也想到，旁的人，一般人，未必人人对“四人帮”的倒台都那么在意。有一个子侄辈的年轻人，回了一趟北京，又回到新疆来，我问他北京的情况，他说：“唉，一开头大家瞎高兴了一阵子，现在呢，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各有感受不同。

但是我要说，我已经被沉默了太久，我已经认定自己不会出声了。我试探地写了一篇小文《诗，数理化》，歌颂高考的恢复，批判

“四人帮”的一切已被揪出示众的谬误,政治上没有一句自己的语言,没有独到的见解,如果说此文有任何可取之处,应在于我长久以来的对于诗歌和数理化的兼收并爱,甚至于我认为“那种一切通过实验的不苟分毫的态度和作风,那种建筑在最平凡最一般的事实与公理上的令人神往的高、精尖的大厦,不都是极其富有诗意的吗?”我赞美诗与数理化都是智慧的硕果,文化的奇葩,远在八十年代福建学者林兴宅提出最高的诗是数学之前。

我是怎样将此文投寄给《新疆日报》的,已经记不起来,反正此前或此后,传出来报纸的说法,说是领导研究了,对王蒙可以抱一个良好对待的态度。这篇文章在报纸副刊上刊登了出来,时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距上次在《新疆文学》上发表《春满吐鲁番》——一九六四年五月——历时十三年多,加上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封杀期,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的半封杀期,我前后被冻结十七年,半冻结四年。

受到小文发表的鼓励,我又写了小说《向春晖》,发表在《新疆文学》一九七八年一月号上。写一个在少数民族地区与农民结合得很好的女农业技术员。连主人公的姓名都充满小儿科的“文革”色彩。王蒙写出这样的小说,不能不说是改造得已经很可以的了。别人读了说是不像鄙人写的,后来我自己读也觉得不太像。作品有筋骨脉络,却没有肌肉神情,没有细节,没有丰满的生活情趣,没有气韵生动。但仍然符合当时的潮流,酷似当时的许多作品,意在笔先,大树先进,斗争激烈,合图合谱合辙,绝对不越雷池一步。同时,这又毕竟是王某写的,有小说人称视角的转换,有农业知识的术语(还真有个务农的样儿呢),有对窃窃私语、是是非非的长舌汉的描绘,还有一句结尾的话,说是:

向春晖的声音是空前的欢快,响亮,明净,像一支金唢呐,震响在弥漫着秋日的白杨和庄稼的香甜气味的空气里。

这句话很长,略显欧化,是王某喜欢写的对于秋天农村与大地的体味。金唢呐的比喻也还差强人意。也可以说这一句是使得孙猴子变成庙宇后露出了馅儿的那根尾巴,那只与庙宇风格不协调的旗杆。

《向春晖》的人物和故事却并非凭空捏造。伊犁巴彦岱公社的公社秘书罗远富,他的妻子,湖南人李惠坤都是那个时代的与少数民族农民结合得极好,服务得极好的典范。可以干脆说李就是我的小说的人物的灵感起源,而我的拔高的写作方法,只是贫乏化了而不是升华了人物的形象。他们都是新疆八一农学院的优秀毕业生。罗不但能讲维吾尔语,而且能用木片写维吾尔书法。罗还有一手绝活,可以用特制的陶土制造馕坑,维语称“吐努尔”,我则喜欢音译为“土炉”。这可是真正的匠人——师傅——大师才干得了的活。李是公社农技站的技术员,经常出没在田间地头,用湖南味的 N、L 不分的维吾尔语推广着“无芒四号”“乌克兰八十四号”“红星二号”优良麦种与“白马牙”“双杂交”等玉米良种,以及其他先进技术。他们曾经住在公社拖拉机站,屋顶上晾着许多他们自种的大个儿南瓜,屋檐上挂着红辣椒,极适应新疆农村的生活。我和芳,头一回吃到带辣味儿的豆豉蒸肉,是在他们那里。

世界与人生有时候是讲不清楚公理与道德的,我过去认为今天仍然认为,毛泽东提倡的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的方向有一股感人的诚实与献身热情,然而仅仅靠奉献与克己的精神,靠道德品质与精神力量硬是解决不了发展问题温饱问题。何等的可叹啊。

他们二位是从底层一步步做起的。后来罗远富曾任吐鲁番地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惠坤则在自治区政府农办工作。

接着收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向前的约稿信。春江水暖鸭先知,杂志送暖作者知。那个年代,能不能上《人民文学》,能不能得到《人民文学》的约稿,竟然成为行情,不,甚至是等级与身份,是命运的通蹇祸福的标志。得到了约稿信,我读了又读,连人家的字体我

也觉得帅气、潇洒、老到。一本杂志是一个机构的代表,而这个机构又是全部组织的一个细胞,想一想就知道有多厉害了,而作家只不过是一个个的个人,歪瓜裂枣似的个人。李準兄有言:“作家莫见面,见面熊一半。”当组织拥有无上的威权的时候,个人,作家,才华,灵感,(被作家们爬的)格子……都显得如何渺小与脆弱!不论是打仗还是修水库,组织化之远远优于个人是明显的,偏偏文学这个玩意儿不能不依赖于作者个人,人越多越搞不好,组织越严密小说或者诗歌越写不成,搞文学,这带来了多少麻烦与悖谬!

对于《人民文学》,应该写点什么,才能表示出王某仍然宝刀未老,仍然不辜负所谓“有文才”的“最高”点评而毕竟又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的王蒙,很有些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呢?

与五十年代的写作相比,这时的思路完全是另一样的了,它不是从生活出发,从感受出发,不是艺术的酝酿与发酵在驱动,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以政治的正确性为圭臬,以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为第一守则乃至驱动力,把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调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形象记忆视为第二原则,视为从属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这样艺术服务政治,应能充分运用自己前后十多年在新疆的体验,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与维吾尔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写出又“红”又专的新作来。

我的新作是《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主题当然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批判,但写得要有生活气息,民族文化气息,有异域风情,有边疆味、农村味、民族味,有维吾尔人——农民——农村干部的形象与生活细节,有意想不到的情节主干:把一只野蛮残暴的猫儿称为莫名其妙地被推崇为法家的“吕后”。这来自我的女房东赫里倩姆妈妈的妙喻的启发:她称一只驯顺聪慧的黑白花猫为“筹委会”,那是伊犁地区一派比较能与领导特别是军区合作的组织大联合后的名称。而另一只乖戾凶狠的虎皮猫,则被房东妈妈称为“红造会”,是另一派以更加造反为标榜的群众组织的通称。这只猫

常常会在有人临近它的时候弓起腰臀,发出喷鼻的“气声”,它的这种怪声曾经把一条大狗吓得后退,从中我算懂得了“一猫拼命三犬难当”的道理,我算懂得了当你处于弱势的时候,你很容易变得铤而走险、穷横亡命的道理。我写到了这样一只“野猫”,写到它咯吱咯吱吃掉了自己刚才生下的小崽儿。我的全部作品中,很少写得这样残酷的。

小说的开头,有王式的一段抒情旁白,文曰:

应该怎样为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画像呢?是刻画他们风吹日晒下黝黑而皴裂的皮肤吗?描写他们的沾满了尘土、芒刺、树叶、粪肥的长靴吗?渲染他们的黑条绒上衣的后背上透过来的白花花的汗渍吗?同情他们的熬红了的眼睛和嘶哑的喉咙吗?羡慕他们在本地的无上威权,走到哪里都被注视、被谛听、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吗?还是为了他们往往处在矛盾的焦点,受到各方的夹击而不平呢?

后来在一九七九年的文代会上,公刘见到了我,特别提起了这一段。这段旁白的用语有点翻译味儿,例如,被注视就不如说是受到注视更顺畅。但是“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说法,如果说成是人们围着他们请示工作和申诉意见,就不够味儿了。我以为,一种来自外文的语法与构词造句方式,一旦为国人所接受,就成为了语言的新的资源,新的补充,就有可能为我们的古老长寿的汉语带来某种新意。

我每每疑惑,如果我一直用《向春晖》《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的创作方法进行下去呢?会不会这也成为一种写小说的路子呢?会不会成为一种符合要求的写作路子呢?主题先行,政治挂帅,推敲(政治)含义,形成轮廓,犹如论文之定出大纲,再补充或填充材料:细节、人物肖像与(所需)个性、风景背景、情绪、语言文字……我甚至怀疑,有并非绝少数的写作人在那个年代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写作路数,已经无法更改,一动笔就是这么个格式,他们甚至很容易投

合需要,符合既定的调式,得到好评,行时于某个特定时段,收到极好的效益。写到这里,立刻有一些姓名与书名呼之欲出。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卓有成绩的著名同行、作家大哥亲口告诉旁人的话:“‘四人帮’倒的时候我还压在县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口袋里装着两篇小说来到了北京探听情况,一篇是批‘走资派’的,一篇是批极左的……你不管怎么变,你难不住咱们!”呜呼哀哉,难不倒的中国作家!他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在‘文革’中被批斗得最狼狈的时候我对老婆说过,别看今天你老公落到如此境地,早晚有一天,你老公也会坐上小汽车!”

啊,文学!最初与你邂逅的时候你是高扬在九天的艺术的安琪儿,有点神秘,十分纯洁,无比动人。你比作者更完美,比生活更迷人,比青春更永久,比欢乐更深情,我想着的是怎么样地小心翼翼地侍奉你,围绕你,服从你与吟味你,用最最尊崇与细致的体贴来表现你,用最最美丽与善良的感悟来接近你,生怕有对你的些许亵渎与冒犯……

而现在,曾几何时,狂风恶浪,电闪雷鸣,狗血喷头,死去活来,千夫所指,人心所向,叱咤暗鸣,天崩地裂,原子爆破,火炮轰击,改头换面,弃旧图新,指天划日,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终于,我明白了,文学是一堆素材、是一堆橡皮泥,艺术是一种手艺、是一种材料、是一种习惯、是一种糊口的方式,是几个手指捏捏揉揉、拉拉扯扯、抠抠拽拽,你要它粗它不会细、你要它大它不会小、你要它往东它绝对不会向西!一石三鸟,鼓舞士气,打击敌人,提升自己,皆大欢喜!

多么难忘,多么可怜,又是多么如意!初夏,下着冷雨,芳从乌鲁木齐十四中的办公室跑到家属院,我正在包韭菜馅饺子,一屋子韭菜味儿,手上脸上都沾上了面粉,饺子已经摆满了一盖浅儿(或称盖垫,指用细秫秸排列固定成的放食品的器具),瑞芳大呼小叫地走了回来,脸色都变了,嗓音都变了,她从来不曾这样:却原来是我的这篇小说发表出来了。不管怎么样地戴着镣铐,至少还有语言与文字的

掂量与发挥,我读着时隔多年又在《人民文学》上亮相的王某人的文字,暖从心来,悲从心来,喜从心来,五内俱热,百感交集:想不到王某人还能等到这一天!这是真实的吗?这就是王某的新作了吗?

立即有老同志老领导告诉我:你还要加把劲呀!不知道是说我写得还不够革命还是不够动人。反正是不完全符合这种要求,却又不符合那种要求。我读着自己的新作,似曾相识,又似乎相当陌生。这是谁写的呢?曰,王某。王某是哪一个?王某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时候只有二十二岁半,现在,距那时又过了整整二十三载了。

我戏改邓拓的诗作曰:

魂断音销二十年,分明火海与魔山。
诗词扫地文章祸,蛊咒遮天瀚墨闲。
屈指可知功又过,关心只在命何堪?
春风又绿北南岸,大道恢恢泪阑珊。

2. 日子又开始了

波浪涌动着波浪,日子开启了日子。此前半年,一九七七年冬,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它对于“文革”造成的心灵创伤的描写使我激动也使我迷惘,我的心脏加快了跳动的节奏,我的眼圈湿润了:难道小说当真又可以这样写了?难道这样写小说已经不会触动文网,不会招致杀身之祸?难道知识分子因了社会的对于知识的无视也可以哭哭自己的块垒?天啊,你已经能够哭一鼻子?

《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的发表意味着我的公民权的部分恢复,我给时在广东,任《作品》主编的萧殷老师写了信,收到他的孩子般热情的回信。他说他见了人就说:“王蒙来信了,王蒙来信了……”

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白桦的紧跟形势的剧作,写革命历史,批极左。从一些文学刊物上,透露出了从维熙、邵燕祥的消息。

全——活——了!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我想起的是杜甫的诗,虽然不是样样贴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沧桑感、幸存感、隔世感竟是一脉相承。我确实觉得自己已经活完了一辈子,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享年四十四岁(我与一批同龄作家所迷恋与崇拜的契诃夫就只活了四十四年,留下了那么多精致与忧伤)。现在,一九七八年开始,我正处于重生过程,我正在且喜且虑,且惊且赞,且悲且决绝地注视着四周,果真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吗?是乍暖还寒抑是欲擒故纵?不是陷阱?不是阴谋?不是几个勇敢分子的横冲直撞,最后导致的只能是头破血流,益发无望?

我五内俱热。我弹额(早已无“冠”可弹)相庆。我不恤一搏。我同时又是左顾右盼,前瞻后顾,不惜用最险恶的心意去做好应对险恶的突变的准备。半生多事,波诡云谲,历史起落,吞噬无情,生聚教训,动辄二十余年,到了这步田地,天真、幼稚、轻飘,就是犯罪也。

我在一九七八年的清明节这一天(由于一九七六年的“四五”,清明节又有了新的意义),写了《最宝贵的》,我已经受到《班主任》的鼓舞,敢于写到滴血的心,写到例如“文革”,例如“四人帮”,总而言之是一种非人的力量把血肉的心换成了冰冷的石头,正像我五十年代看到过的民主德国电影《冷酷的心》那样。也是在东德的这部电影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德意志民歌《毋忘我》:“有花名毋忘我,开满蓝色花朵,愿你佩戴于身,常思念我……”所有这些被扼杀被活埋了的柔软的心灵的颤抖,居然“撑”到了复活的一日,终于可以被引用,可以成为王某小说新作的理念与素材。我只敢谴责那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文革”中的本来可以原谅的失误(把一个“走资派”的藏身地点告诉了造反派,导致了这位“伯伯”的不幸),我不谴责他又去哭谁去?至于他的所谓错误,所谓过失,所谓造成的严重后果,该去问责于谁,我想那是读者自己去想,也可以想明白的事。(北京有句俚语:惹不起锅,便去惹笨篱。这是我不得不采用的某种方略。这里我骂的似乎是孩子,因为骂孩子相对不会找其他的节外生枝的麻烦。你认为责任不在孩子,太棒了,我成功了。而在小说《轮下》中,我结